

苏兆征——从工运领袖到中共重要领导人

刘利亚

苏兆征作为中国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共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中共五大、八七会议期间，苏兆征由一个工人运动领袖逐渐成为中共早期的中心领导之一，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工人运动领袖

1885年11月，苏兆征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淇澳村。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里，他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兆征同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创者，是震动世界的1922年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粤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工人运动直接推进了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影响工人斗争的剧烈和激进。”两种运动相互促进，使中国革命高潮迭起不断前进。而苏兆征“十余年来历尽艰苦，领导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意志而奋斗。他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上为中国革命的先锋！”^①

一、领导武汉人民抗议日军暴行，妥善处理“四·三”惨案

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武汉地区成了新的革命中心。1926年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从广州迁都至武汉。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也促进反帝斗争的深入发展。

面对着反帝斗争高潮迭起，帝国主义加紧与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千方百计力图颠覆武汉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蒋介石与汪精卫也在紧张策划，磨刀霍霍，准备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狠下毒手。

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抵达武汉的苏兆征，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苏兆征到达武汉的第三天，即4月3日，汉口发生“四·三”惨案。

4月3日下午4时，4名日本水兵乘坐人力车，不按规定付足车费。车夫不答应，要求补足车费。日本水兵却把车夫打成重伤。一个路经此地的工人立即上前抢救，日本水兵当场把他刺死。这时，酒店内的多名日本水兵，跑到街上一同行凶。附近的

群众闻讯赶来，制止日本水兵暴行和抢救受伤车夫，当场捉获6名日本兵。日租界当局调来大批水兵，向群众乱枪扫射，9人中弹死亡，30多人受伤。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正如当时有的报纸所说：“帝国主义者在汉口之屠杀，此为最惨”^②。

面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发生，苏兆征与刘少奇、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武汉人民掀起一场抗议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暴行的斗争。4月4日，武汉各群众团体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议：要求立即撤退日本水兵；收回日本租界；凶手交中国法庭惩办；赔偿死伤者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武汉政府谢罪，并保证以后不再有此惨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发生等。翌日，由全国总工会、湖北总工会等17个团体共同组成一个“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不久改名为“湖北各界外交后援会”）具体领导这一斗争的进行。4月6日，武汉各界群众代表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和武昌阅兵场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难者大会，严重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暴行。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反咬

一口，诬蔑我国人民“狂烈排外”，乘机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进一步武力干涉；同时与英帝国主义者勾结一起，命令日、英商人关闭在武汉地区开设的企业，造成2万多工人失业，借以破坏武汉的社会秩序和局势，向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为妥善解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关闭企业而造成大量工人失业的困难，继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在全国总工会的要求下，国民政府决定组织成立“四三惨案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简称“四三救济会”），以苏兆征、谭平山与陈公博3人为委员^③，负责处理善后各项事宜。在苏兆征的再三敦促下，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用于抚恤、救济工作等。

二、主持太平洋劳动会议，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

1927年5月20日，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武汉开幕。日本、苏联、朝鲜、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工会代表，以及由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林育南等15名代表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一起参加会议。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会议的召开。

苏兆征在充满革命激情的开幕词中，报告这次会议的筹备过程，阐述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他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运动，当然是对着世界各帝国主义进攻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④

会议于5月26日闭幕后，接着在汉口由苏兆征主持召开太平

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会议。中国代表苏兆征、李立三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尼、朝鲜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就秘书处的任务进行认真的讨论。反对帝国主义扼杀中国革命，是秘书处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决定秘书处的成员，由中国代表2人，苏联代表2人，美、英、法、日、印尼、朝鲜的代表各1人组成。苏兆征被选为秘书处负

色恐怖越来越严重，革命形势日趋危急。为总结北伐战争以来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确定工人阶级当前和今后的斗争任务和方针、策略，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发表《宣言》。《宣言》指出：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最紧要的时刻。

为筹备这次大会，苏兆征做



1925年7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共产党人苏兆征（中）、邓中夏（后排右一）担任委员长和顾问。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成员合影。

责人。各国代表对苏兆征领导中国工人运动、促进太平洋地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从此，“苏兆征在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中的影响亦日益加深了”^⑤。

三、主持召开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工人运动的领袖地位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后，白

了大量的工作。大会开幕前夕，他作为上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当前面临的形势和这次大会所要解决的重大议题。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开幕。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420人，代表会员290余万人。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和苏、美、英、法、日、印尼等国的工人代表，以及共产党、国民党、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和各界来宾3000多人参加开幕典礼。

苏兆征任大会主席,主持开幕典礼并致开幕辞。会议期间,苏兆征还代表全国海员总工会向大会作《关于海员过去奋斗的历史及在当前革命中的责任的报告》。他又以国民政府劳工部长的身份,作《关于劳工部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坚决向广大工人群众表示:“劳工部要为工人谋利益,如果我们不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革命便得不到保障。”^⑥

大会选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苏兆征和刘少奇、邓中夏、李立三、王荷波、林育南、项英、朱宝庭等3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在6月30日召开的新的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众望所归,再次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表明他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心目中,是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国民政府劳工部长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苏兆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产业工人出身的政府部长。他坚持共产党员立场,努力为工人办实事;在汪精卫集团叛变后,不存幻想,坚决辞职。

一、接受共产党委派,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会后,苏兆征和谭平山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分别担任国民政府劳

工部长和农政部长。苏兆征等共产党人还参加武汉市政府工作,担任市政委员会委员的职务^⑦。

1927年4月1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革命的象征》的社论,热烈欢迎苏兆征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对他表达了崇高的敬意。社论特别强调指出:“苏兆征同志代表全国280万革命的产业工人站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工人阶级已经领导着,而且正在领导着,并且继续领导着中国的国民革命,一直到世界革命”。

当时,武汉各机关、团体还相继举行一系列欢迎活动,热烈欢迎苏兆征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5月30日,劳工部于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大舞台隆重举行苏兆征就职典礼。武汉地区各工会团体都派出代表前往祝贺,为苏兆征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一个参加国民政府出任劳工部长而欢呼。苏兆征在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表示:“兆征以一工人,谬膺重命,誓当恪守(孙中山)总理农工政策”;^⑧他已经预感到国民革命面临着惊涛骇浪,但是他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因此他特别强调说:“现在中国革命确是到了一个危险时期。帝国主义最近除了用武力恐吓政策之外,上海的反动分子又集中起来,想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但是不怕,只要我们各界同胞更加努力团结奋斗。”^⑨

二、参与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积极为工人办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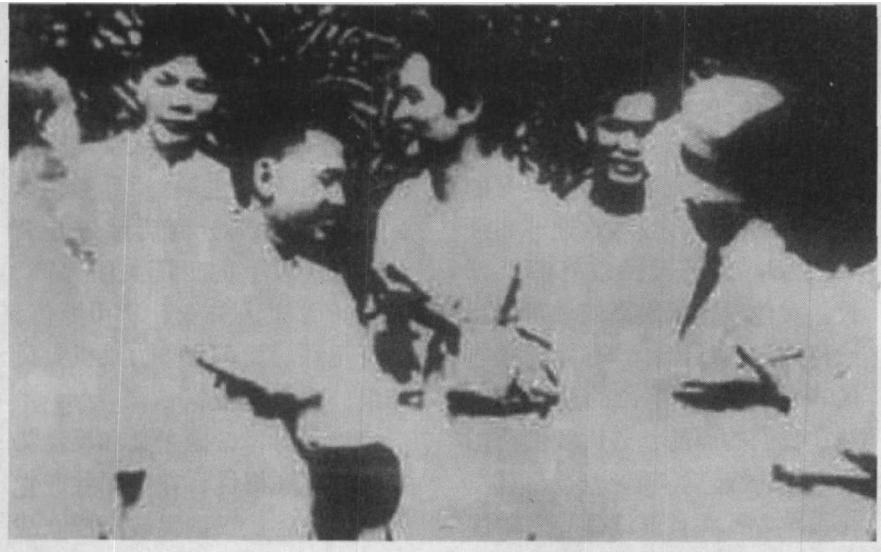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

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进一步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5月中旬以后,武汉大部分商店都停止营业,70%以上的工厂关闭停产,二三十万工人失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反革命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捣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战时经济委员会,由汪精卫、宋子文、谭延闿、孙科和苏兆征等担任委员^⑩。根据战时委员会的有关决定,苏兆征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共产党人一起,领导武汉广大工人群众,进行一系列反经济封锁的斗争。苏兆征参加劳资仲裁委员会的工作,制定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待遇、工时长短等条件,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使经济暂时稳定下来。

为了更好地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4月20日,湖北总工会在汉口举办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苏兆征在百忙中抽空参加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他号召工人纠察队员要严守纪律,服从指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他强调指出:“打倒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扫除一切封建势力及宗法思想,革命才能成功,真正自由解放才能实现。”^⑪

当时,在武汉地区的职工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行为和不正当的现象,如无限制地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随便没收工厂、商店,有的工人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服从管理人员指挥,等等。而苏兆征没有进行指责、攻击,而



1922年，苏兆征（右3）与海员工人在一起。

是实事求是地指出错误，劝告各工人团体及工人群众注意纠正这些过火的幼稚行为。他以国民政府劳工部长的名义，于6月17日发表一个布告，指出：“工人农民甫经解放，不免有初期的幼稚行为，遂使工农与工商业者的革命同盟发生罅隙。最近中央对于巩固革命同盟，已经三令五申，本部长自当切实执行。此后各劳工团体或个人，如有违反中央迭次训令之幼稚行为，当依法撤究，决不偏袒。”^④

苏兆征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全心全意为广大工人群众谋利益。他亲眼看到，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尽管搞得轰轰烈烈，但工人的利益却没有法律保障。他抓住出任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这一有利时机，亲自主持起草了《劳动法》，要求国民政府付诸实行，以切实保障工人的利益。苏兆征在武汉工作期间，就是这样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力挽狂澜。

三、坚决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变，辞职退出国民政府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局势日益恶化。6月28日晚，在汪精卫集团的唆使下，发生了武汉驻军李品仙部非法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办公地点并对工会强行搜掠事件。6月29日，苏兆征以劳工部长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当场揭露军队非法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地点的事实^⑤。尽管军队被迫撤走了，但是武汉局势却日益恶化，因此苏兆征更加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积极着手对付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美国记者斯特朗，曾就军队非法强占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地点一事采访苏兆征。苏兆征向她详细地介绍了这一事件的经过，沉着而冷静地说：“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办公了，谁晓得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情。”^⑥

这时候，国民政府劳工部还有10多万元存款。为了不让这笔巨款落入汪精卫集团手中，用作反革命活动经费，苏兆征当机立

断，把这笔钱作为救济款，全部发给失业工人。接着，苏兆征和谭平山联合发表《辞职书》^⑦，宣布退出国民政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不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一再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终于公开背叛孙中山亲手制定的国共合作方针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大肆追捕与通缉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苏兆征也在其公布的通缉名单之上。他们肆无忌惮地镇压工农运动，实行极其恐怖的血腥屠杀，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让一人漏网”，其残暴行动不亚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苏兆征没有丝毫的畏惧和动摇，他及时而机智地转入了秘密活动，继续坚定地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进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在苏兆征主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反抗压迫工人工会的宣言》，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无耻行径及其残暴屠杀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在苏兆征组织和领导下，8月2日，武汉地区工人奋不顾身地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这次罢工斗争，“兆征同志主持之力是很大的。”^⑧

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正是由于苏兆征在工人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他坚定的共产党员立场，使他在党内的威信越来越高。苏兆征的亲密战友邓中夏

对他作出高度评价：“兆征同志是由不断斗争中，由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是海员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为这样伟大的领袖，在东方还只有兆征同志一个。”^①这一评价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参加中共五大会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兆征和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邓中夏、陈延年、彭湃等8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党员57900多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选出29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②。从此，他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成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二、八七会议前后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以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都先后离开了武汉，奔赴九江、南昌，积极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苏兆征也离开武汉，秘密前往九江一带，动员工人群众拿起武器，投入斗争，积极配合南昌起义。

7月19日至24日，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在九江接连开了几次会，具体研究讨论关于举行南昌

起义问题。苏兆征也参加了会议。^③在九江召开研究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也赶来参加，详细讨论了南昌起义的计划、纲领等一些具体问题，并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南昌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占领了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前夕，苏兆征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参加筹备召开八七会议工作的通知，从九江日夜兼程赶往武汉，没有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在他亲自组织发动下，“九江工人联合2万余起义的军队，举行了暴动”^④。这次起义，苏兆征是功不可没的。南昌起义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苏兆征与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周恩来、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贺龙、叶挺、彭湃等25人，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这表明苏兆征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

苏兆征从九江赶返武汉后，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武汉地区已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局势十分险恶。苏兆征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得到革命群众的掩护，舍生忘死地在武汉坚持革命活动。8月3日，苏兆征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瞿秋

白、李维汉、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林育南等人。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改组中共中央等问题。苏兆征和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都作了发言。确定了紧急会议的主要议程，讨论通过了会议有关文件决议。苏兆征还具体分工负责起草会议的部分文件，“八七会议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便是他起草的”^⑤。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罗亦农、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7人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由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苏兆征兼管工委，李维汉兼管组织部、秘书厅等。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赴北方局、张太雷赴南方局工作^⑥。此期间，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苏兆征由于革命工作需要，不顾个人安

危，经常化装往返和活动于武汉和上海之间。这时，与他共同奋斗多年、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亲密战友林伟民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去世。得知这一不幸消息，苏兆征深感悲痛。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耳闻目睹自己的战友有的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有的因受反动派迫害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因而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意志益坚。

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和进步力量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之下，苏兆征临危不惧，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受命于危难之时，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正如邓中夏在《苏兆征同志传》中写道：“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以党的使命来往于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种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②

苏兆征确实不愧为一个顶天

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幸，苏兆征积劳成疾，1929年2月在上海因病与世长辞，终年44岁。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人，中国工人阶级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贞不渝的优秀战士，这确实是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据邓颖超于1985年11月16日与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的谈话透露，为了改善和加强党中央的领导，中共中央曾经准备让苏兆征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只可惜他过早逝世，来不及实现。^③

注释：

①《苏兆征与中国苏维埃》，载《劳动》第24期，1930年2月21日出版。

②③④⑦⑧⑨⑩⑪⑫《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4月10日、5月27日、4月14日、5月31日、4月4日、4月17日、4月22日、6月17日。

⑬⑭⑮⑯⑰⑱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载《苏兆征研究史料》第343、342、346、345、34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⑲北京《晨报》，1927年7月10日。

⑳《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

会第33次会议速记录》，原件存武汉市档案馆。

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北京世界出版社出版。

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向导》第201期，1927年7月18日。

㉓《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向导》第201期，1927年7月18日。

㉔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出版；邓中夏的《苏兆征同志传》也认为苏兆征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龚饮冰在《纪念苏兆征同志逝世30周年》一文中却认为苏兆征在党的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㉕据邓鹤鸣回忆资料（1959年），载九江党史办公室编《介绍有关革命活动案卷》第14号。

㉖苏兆征：《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1928年2月4日，载《泛太平洋工人》第1卷，1928年3月1日。

㉗《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出版。

㉘见1985年11月20日《工人日报》。

（作者单位：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接第28页）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坚持党对团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时时刻刻将革命的目标悬在眼前”，避免“半途而废”和“失其目标”的危险，才能完成青年运动的历史使命；他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斗争中发展团组织，开展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与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夺青年一代，把青年引向革命的

道路，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远大的战略思想，以及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我们应当进一步学习研究，并继承发扬。

参考书目：

1.张太雷研究会《醒世惊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张太雷研究会《张太雷研究文集》1998年版。

6.胡提春：《张太雷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及其重大贡献》，《醒世惊雷》中央文献出版社。

7.孟越才：《张太雷同志对早期青年运动的贡献》《青年学报》1989年第3期。